

潘佩珠研究述評（1950-2010） 及其漢文小說研究之意義

羅景文

摘要

潘佩珠（Phan Bội Châu，1867-1940）是近代越南民族運動的重要領袖，也是越南知識分子中較早「開眼看世界」，了解世界局勢的先行者。而潘佩珠身處世變之際，無論是他的政治或革命行動，還是他與東亞各國知識人的交流互動，抑或是他那文史哲多棲的創作身份，以及以儒學為根柢所面臨的知識轉型，在在都呈現出高度的流動性與複雜性，洵為近代東亞——越南知識人的代表之一，也因此在學界逐漸開展出多元豐饒的議題與面向。

但由於過去的陌生與忽視，加上語言（尤其是越南語）的隔閡，使得欲進行此一課題的研究者，不容易掌握越南或是國際間對於潘佩珠的研究成果。因此，的確有進行相關研究回顧，以提供學界參考的必要性。而筆者在回顧潘佩珠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以他的漢文小說為例，說明未來可資拓展與深化研究的方向。

一、前言

近代東亞知識分子究竟如何進行選擇、吸收、轉化、重組等一連串關於建

關鍵詞（Keywords）：東亞；近代越南；潘佩珠；漢文小說

羅景文：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E-mail：jiingwen123@pchome.com.tw

構自身知識系統之思維活動，是饒富興味卻又不易處理的議題。相較於學界對於日、韓知識人參與近代東亞知識階層之互動的討論，已有多元的視角和較為豐厚的成果，而關於越南知識分子參與近代東亞知識圈的討論則較少受到關注。實際上，越南知識分子在近代東亞知識轉型與區域互動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與作用。對於他們的探討，亦是東亞整體研究視角下不可或缺的一環。

在二十世紀前後，越南民族運動的重要領袖潘佩珠（Phan Bội Châu，1867-1940）便是越南知識分子中較早「開眼看世界」，了解世界局勢的先行者。潘佩珠原名潘文珊，號巢南，又號是漢，是越南近代愛國志士，也是越南重要的文史學家。1867年出生於義安省南壇縣一個鄉學教師家庭。自幼跟隨其父（潘文譜，1830-1900）接受儒學教育，精通漢文，曾中解元。1885年他決心反抗法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殖民，曾聚集六十多名同學組成「試生軍」保衛國家。從1900年起，在全國各地聯繫愛國者，進行抗法運動。1904年4月成立「維新會」（Duy Tân Hội），其宗旨是「恢復越南，建立君主立憲國」。1905年初到日本，先後結識梁啟超（1873-1929）、孫中山（1866-1925）、章太炎（1869-1936），以及雲南廣西在日留學生，同時也與日本維新大臣大隈重信（1838-1922）、犬養毅（1855-1932）等人有所聯繫，爭取援助。之後，他多次來往於中、日、越三國，暗中進行革命活動，並號召青年學生赴日本留學，史稱「東遊運動」（Phong Trào Đông Du）。因為他和其他志士的努力，至1907年已有二百位越南青年到日本留學，但在1909年2月，潘氏與畿外侯彊柢（Cường Để，1882-1951）因反法運動而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東遊運動被迫解散。後來，他受到辛亥革命的影響，1912年2月於廣州成立「越南光復會」（Việt Nam Quang Phục Hội），並擔任總理，其政治方針為「驅逐法賊、恢復越南，成立越南共和國」。1913年在廣州被捕入獄，至1917年獲釋。潘佩珠日後多以杭州為據點，推動越南的抗法革命運動。1922年2月，潘佩珠應浙江督軍府顧問兼軍事編譯館館長林之夏（1878-1947）之邀，擔任杭州《兵事雜誌》編輯，但早在他擔任編輯之前，就已經在《兵事雜誌》發表作品了。1924年潘氏於廣州解散光復會，成立「越南國民黨」（Việt Nam Quốc Dân Đảng）。1925年5月11日（陽曆7月1日），他在上海準備為留學德國之陳仲克（Trần Trọng Khắc，1884-1965）匯款時，為法國特務綁架於上海車站北站，遂被押解回越，軟禁於順化御津，至1940年去世。

就潘佩珠這樣身處世變之際，而亟欲帶領越南脫離法國殖民統治的知識分子來說，無論是他的政治或革命行動，還是他與東亞各國知識人的交流互動，抑或

是他那文史哲多棲的創作身份，以及以儒學為根柢所面臨的知識轉型，在在都呈現出高度的流動性與複雜性，洵為近代東亞——越南知識分子的代表之一，也因此此在學界逐漸開展出多元豐贍的議題與面向。中文學界雖然已有研究者關注到潘佩珠，並展開研究，但就整體來說，仍有不少研究者對於潘佩珠及其研究的概況感到陌生，這肇因於過去缺乏對東亞成員之一——越南的認識與理解。目前，兩岸四地的學術研究機構正積極推動東亞整體研究，紛紛展開跨領域／跨國界（地域）／跨文化的研究計畫，越南及相關研究在此學術潮流中，得到了有別以往的重視。^[1]像潘佩珠這樣具有代表性與多元性的越南知識分子／革命者，也逐漸獲得中文學界的關注。

筆者為進行潘佩珠的相關研究，曾於2010年2月至2010年8月前往越南河內蒐集資料，以越南國家圖書館（Thư Viện Quốc Gia Việt Nam）、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Viện nghiên cứu Hán Nôm）與史學研究所（Viện Sử học）等學術研究機構為主，獲得越方不少關於潘佩珠的研究成果，而此時亦著手蒐集整理國際間對於潘佩珠的研究資料。由於過去的陌生與忽視，加上語言（尤其是越南語）的隔閡，使得欲進行此一課題的研究者，不容易掌握越南或是國際間對於潘佩珠的研究成果。因此，的確有進行相關研究回顧，以提供學界參考的必要性，一來可省去研究者摸索及蒐尋資料的寶貴時間，二來也可避免相同研究議題的重複操作。本文試圖分別從越南、歐美、日本，以及中文學界等學術社群出發，介紹評議各學術社群進行潘佩珠研究時的關懷取向。同時在回顧潘佩珠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從自身的研究關懷出發，以「潘佩珠漢文小說研究」為例，進一步思考潘佩珠後續研究可資拓展與深化的課題。

二、潘佩珠重要研究成果述評

潘佩珠長期奉獻於越南民族獨立運動，從越南民族抵抗法國殖民尋求獨立的過程來看，他正好介於上一代傳統官僚式的武力對抗（如各地響應王室號召抗

^[1] 就漢學界來說，1980年代旅法學人陳慶浩教授熱心提倡「漢文化整體研究」，進而在法國遠東學院、臺灣中國文化大學與越南漢喃研究所的跨國合作之下，先後整理出版二輯《越南漢文小說叢刊》（臺灣：臺灣學生書局，1987、1992）。近期則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與漢喃研究所合作推出《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以及以上海師範大學為首，結合中、法、越、臺灣等地的合作成果出版《越南漢文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而這些大型越南漢籍文獻的整理出版，使越南漢籍與漢文小說得到有別於過去的關注，進一步推動相關議題的討論，也為未來東亞漢文學與漢文化的研究注入新血。

法的「勤王運動」)，以及下一代接受西方或新式教育的革命者（如胡志明，1890-1969）之間。因此，無論是他的政治革命活動，還是他的思維轉變歷程，在越南歷史上都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與意義，也是越南相關學界研究的重心之一。除此之外，潘佩珠的革命行動也與中國、日本，甚至是東南亞等地有所關連，進而吸引了中文、日文、歐美學界投入探討研究的行列。有鑑於各學術社群有各自的學術風氣與關懷面向，在研究成果的反映上亦有深廣多寡之別，呈現出不同的研究特色。因此，筆者在相關文獻的回顧上，依不同學術社群屬性，分別評述各地學界研究潘佩珠及其作品的成果與特色，並歸納研究趨向，提供學界未來進行潘佩珠研究之用。

（一）越南方面

就越南學界來說，已有章收（Chương Thu）^[2]、陳義（Trần Nghĩa）等研究者針對潘佩珠的研究概況進行回顧，如陳義有〈回顧潘佩珠的研究情形〉一文^[2]，而章收則有〈從過去到現在關於潘佩珠的研究情形〉、〈一些關於潘佩珠必須繼續研究的問題〉、〈近年來關於國外研究潘佩珠的情形〉三文^[3]，分別評述不同時段越南與國外學術社群的研究成果，這些觀點正反映越南學者看待自身或國外學術研究社群的角度，值得我們參考借鏡，筆者亦在他們的基礎上，進一步說明自1950至2010年這六十年來越南學界研究潘佩珠的概況。

這六十年來越南學界對於潘佩珠的研究成果，從歷時角度來看，大致可分為：1950年至1970年、1971年到1990年，1991年迄今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50

^[2] 陳義（Trần Nghĩa），〈回顧潘佩珠的研究情形〉（“Nhìn Lại Tình Hình Nghiên Cứu về Phan Bội Châu”），載於：（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文學研究所（Viện Văn Học）編，《愛國者與作家潘佩珠——潘佩珠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Nhà Yêu Nước và Nhà Văn Phan Bội Châu : Kỷ Niệm 100 Năm Ngày Sinh Phan Bội Châu*）（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70），頁321-352。作者在評述相關研究之後，詳細討論個人對於潘佩珠思想與文學之特色的看法，唯篇幅多於研究回顧，而這些討論似可另成一篇專門論述。

^[3] 1. 〈從過去到現在關於潘佩珠的研究情形〉（“Tình Hình Nghiên Cứu Phan Bội Châu từ Trước đến Nay”），《歷史研究》（*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104（1967.11），頁6-16。
2. 〈一些關於潘佩珠必須繼續研究的問題〉（“Một Số Vấn Đề Cần Tiếp Tục Nghiên Cứu về Phan Bội Châu”），《社會科學通訊》（*Thông Tin Khoa Học Xã Hội*），1（1993），頁56-62。此文亦載於：章收，《潘佩珠研究》（*Nghiên Cứu Phan Bội Châu*）（河內：國家政治出版社，2004），頁747-755。
3. 〈近年來關於國外研究潘佩珠的情形〉（“Về Tình Hình Nghiên Cứu Phan Bội Châu ở Nước Ngoài Những Năm Gần Đây”），《文學研究》（*Nghiên Cứu Văn Học*），4（2008），頁3-14。唯後兩者屬於介紹性的概說，多為資料的整理與摘引。

年至1970年，此時屬於潘佩珠研究的起步時期，雖然早在潘佩珠生前及1940過世之後，已陸續有相關的討論問世，但受到反殖民運動與八年（1946-1954）抗法戰爭的影響，學術研究顯得零星遲緩，而較具規模的討論直到北越成立（1954），並設立學術研究機構之後才開始。因此，起步時期的潘佩珠研究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著重於作者生平及相關作品文獻的介紹整理、鉤輯考訂。由於潘佩珠的生平與活動有不少模糊空白之處，再加上他的著作及與東遊運動有關的檔案甚多，不少資料四散各地，其中亦有許多漢文著作，這使得越南學界在研究伊始，就必須先進行作者生平及相關文獻資料的整理發掘、注釋翻譯，以進一步建構潘佩珠的生命史（如編寫傳記），並展開後續的研究工作。當時幾位較重要的學者都參與了這樣的工作，如英明（Anh Minh，原名吳成人Ngô Thành Nhân）^[4]、陳輝燎（Trần Huy Liệu）^[5]、孫光閔（Tôn Quang Phiệt）^[6]、鄧泰梅（Đặng Thai Mai）^[7]、章收^[8]等人。其中又

-
- [4] 1. 《潘佩珠逸史》（*Dật Sử Phan Bội Châu*）（順化：嘉龍出版社，1950）。
2. 《畿外侯疆抵與潘佩珠、潘周楨和黃叔抗》（*Kỳ Ngoại Hầu Cường Để, với Phan Bội Châu, Phan Châu Trinh, Huỳnh Thúc Kháng*）（順化：英明出版社，1951）。
3. 《在潘佩珠引導之下，遊學日本的愛國志士和學生》（*Những Chí Sĩ Cùng Học Sinh Du Học Nhật Bản Dưới Sự Hướng Dẫn của Cụ Sào Nam Phan Bội Châu*）（順化：作家出版社，1952）。
4. 《被監禁在順化十五年的巢南先生》（*Cụ Sào Nam 15 Năm Bị Giam Lông ở Huế*）（順化：英明出版社，1956）。
- [5] 1. 〈回憶御津老人〉（“Nhớ Lại Ông Già Bến Ngự”），《歷史研究》，47（1963.2），頁40-44。
2. 〈介紹潘佩珠在史學上的一些意見〉（“Giới Thiệu Một Vài Ý Kiến của Phan Bội Châu về Sử Học”），《歷史研究》，104（1967.11），頁2-5。
3. 〈潘佩珠——二十世紀初越南愛國運動的代表〉（“Phan Bội Châu: Tiêu Biểu cho Những Cuộc Vận Động Yêu Nước ở Việt Nam Đầu Thế Kỷ XX”），《歷史研究》，105（1967.12），頁1-10。
- [6] 1. 《潘佩珠與潘周楨》（*Phan Bội Châu và Phan Châu Trinh*）（河內：文史地研究協會出版社，1956）。
2. 《潘佩珠與越南人民抗法歷史階段》（*Phan Bội Châu và Lịch Sử Một Giai Đoạn Chống Pháp của Nhân Dân Việt Nam*）（河內：文化出版社，1958）。
3. 〈我國民族解放史中的潘佩珠〉（“Cụ Phan Bội Châu trong Lịch Sử Giải Phóng Dân Tộc của Chúng Ta”），《文史地》（*Văn Sử Địa*），13（1956.1），頁53-65。
- [7] 鄧泰梅，《潘佩珠詩文》（*Văn Thơ Phan Bội Châu*）（河內：文化出版社，1958）。
- [8] 章收相關論述甚多，較主要者如：
1. 〈一部潘佩珠的作品——是《重光新史》還是《後陳逸史》〉（“Một Tác Phẩm của Phan Bội Châu: *Trùng Quang Tân Sử* hay *Hậu Trần Dật Sử*”），《文史地》，48（1959.1），頁82-90。
2. 〈關於潘佩珠與疆抵兩人關係的一些資料和看法〉（“Một Số Tài Liệu và Ý Kiến về Mối Quan

以《獄中記》與《潘佩珠年表》（或稱《自判》）為最受關注，前者是潘佩珠被當時的廣東都督龍濟光（1868-1925）囚於廣州時所作（寫於1913年），後者則是1925年他被法人軟禁於順化御津之後所作（寫於1929年），這兩部自傳對於了解潘佩珠生命史及其思想極為重要，加上兩者在版本以及同一事件的論述上有著詳略矛盾的差異，因此吸引不少學者將其翻譯出版，或是進行探討。^[9]

其次，則是著重於潘佩珠的政治活動及其思想傾向的討論。潘佩珠領導東遊運動以抵抗法國殖民，雖以失敗告終，但其愛國情操與奉獻的心力，以及促進民族團結的作用是無庸置疑，越南學界對此大都給予高度的肯定。不過，由於潘佩珠的政治活動與思想體系介於新舊世代之間，再加上他曾一度呼籲與法殖民政府合作，提出所謂「法越提攜」的口號，而引起軒然大波，雖然他不久之後又重新回到抵抗殖民運動的行列，但是他抗法的姿態已有所游移。上述這些狀態在在說明了其思維的雜糅多變，學界曾針對潘佩珠的思想傾向展開頗為激烈的討論。^[10]

大致上來說，起步時期的潘佩珠研究，在作者生平與文獻的考訂整理有較大的成績，對於潘佩珠的歷史評價雖高，但明顯受到歷史文化語境的制約影響。越南才於1954脫離法國殖民的烽火，卻又掉入了與美國所扶植的南越政權相互對峙

Hệ giữa Phan Bội Châu và Cường Để”），《歷史研究》，45（1962.12），頁19-24。

3. 〈潘佩珠最早的兩份外交文件〉（“Hai Văn Kiện Ngoại Giao Đầu Tiên của Phan Bội Châu”），《歷史研究》，90（1966.9），頁61-64。

4. 〈潘佩珠生於何年？〉（“Cụ Phan Bội Châu Sinh Năm Nào?”），《歷史研究》，97（1967.4），頁60-61。其餘詳參拙著，〈潘佩珠研究論著目錄（1950-2010）〉收入：王三慶、陳益源主編，《東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論叢（二）》（臺北：樂學書局有限公司，2011），頁265-308。

[9] 《獄中書》與《潘佩珠年表》最早分別在1945年和1946年已被翻譯出版，而在這個時期，主要有英明翻譯的《自判》（*Tự Phán*）（順化：英明出版社，1956），以及由范仲恬（Phạm Trọng Diễm）與孫光閔翻譯的《自批判》（*Tự Phê Phán*）（河內：文史地研究會，1955），後者日後重新修訂，改以《潘佩珠年表》（*Phan Bội Châu Niên Biểu*）為題出版（河內：文史地出版社，1957）。至於相關研究則有陳明書（Trần Minh Thư），〈從《獄中書》到《潘佩珠年表》〉（“Từ Ngục Trung Thư đến Phan Bội Châu Niên Biểu”），《歷史研究》，69（1964.12），頁46-51。章收，〈關於潘巢南的兩部自傳：《獄中書》與《潘佩珠年表》〉（“Về Hai Tập Tự Truyện của Sào Nam: Ngục Trung Thư và Phan Bội Châu Niên Biểu”），《歷史研究》，75（1965.6），頁37-45。

[10] 章收曾歸納此時學界論辯的幾個主題：(1) 潘佩珠的運動性質和思想體系。(2) 潘佩珠的革命和改良思想。(3) 潘佩珠對法國的提攜思想。(4) 潘佩珠的社會主義思想。(5) 潘佩珠的哲學觀與世界觀。(6) 其它。詳見同註3之1，頁10-11。陳義也觀察到這個現象，他認為學界的討論則主要圍繞：(1) 潘佩珠的意識形態與思想體系。(2) 潘佩珠對社會主義的態度。(3) 潘佩珠思想的屬性（唯物與唯心、辯證與形上、必然與偶然）等三個主題，詳見同註2，頁325-328。

的泥淖中，並爆發所謂的「越戰」（1959-1975）。從「抗法」到「抗美」，潘佩珠的愛國熱情及民族團結主義，及其文學用以抵抗敵國、解放民族的大纛被高高舉起，藉此鼓舞情緒、凝聚民族，而對其思想傾向的論爭，主要也是用來確定他在歷史中的地位與意義，進一步讓他的思想與行動為當局服務，更具有論述的合理性與正當性，這正是當時潘佩珠研究最為鮮明突出之處。^[11]此外，在論述的開展上，大多仍屬於通論或是概論式的介紹說明，更為深入的議題則有待日後的挖掘。

有別於前一個時期的熱烈，第二階段（1971-1990）越南學界研究潘佩珠的熱度似乎有降溫的趨勢，但仍有以下幾個特色：首先，是潘佩珠生平及其著作整理考訂的工作仍持續不斷，此時章收在潘佩珠資料文獻的蒐集整理、編譯介紹上用力甚深，不斷在刊物上介紹發表與潘佩珠有關的新材料，或是繼續釐清相關問題（如《潘佩珠年表》），更於1990年整理出版《潘佩珠全集》十冊，幾乎囊括了當時可見的潘佩珠之著作，並加以考證註釋，這代表了當時越南學界對於潘佩珠文獻整理的最新成果，也是日後欲研究潘佩珠者不得不參考的重要著作。^[12]其次，雖然潘佩珠的政治活動與革命思想等層面仍是學界熱衷討論的重點，意識型態批評的力道依然強勁，但也逐步擴及潘佩珠被法人軟禁後的生活及著作，而這是前一階段北越成立之後，學界較少碰觸的議題。^[13]而在這個時期最重要的關鍵，是1986年越南共產黨宣布推動「革新」政策，試圖從經濟到政治，甚至是思維方面進行革新。^[14]隨著革新政策的推動，越南學界對於潘佩珠的研究也逐漸走向多元開放，但這要等到下一個階段才有較為清晰的輪廓。

^[11] 陳義認為學界即使對潘佩珠的思想有不同的看法，但都能認同潘佩珠思想的三大特色，即「愛國主義」、「武裝暴動路線」，以及「民族團結主義」，這樣的理解正呼應著當時的時空背景。詳見同註2，頁328-337。至於潘佩珠文學作品的意義，則以鄧泰梅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認為對潘佩珠來說，文學是以為革命服務為目的，潘佩珠作品的重要價值在於愛國思想與革命內容，見同註7，頁92。

^[12] 章收，《潘佩珠全集》（*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順化：順化出版社，1990）。

^[13] 1954年北越成立之後，甚少學者討論潘佩珠被法人軟禁之後的事蹟、思想及其著作，因為這個時期的潘佩珠已經失去帶領越南人民抗法的實際能力。因此，強調或進行此一時期之潘佩珠的研究，並不符合越戰當時訴諸民族主義或是愛國熱情以抵抗外敵的要求。受到當時意識型態的影響，反映在學術研究上，便是相關研究成果極為薄弱，南越學者英明《被監禁在順化十五年的巢南先生》是少數探討此議題的著作。

^[14] 參見于向東、譚志詞，《越南——革新進程中日漸崛起》（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5），頁99-106。陳鴻瑜，《越南近現代史》（臺北：國立編譯館，2009），頁389-392。

第三階段（1991年迄今）是越南學界研究潘佩珠邁向多元視野、互動交流的時代。我們可以從章收在1993年的觀察切入，他認為在「革新」之後，越南學界開始擺脫傳統從政治或是歷史出發的研究視角，並了解到1925年之後的潘佩珠對建構其生命史與精神面貌的重要意義。^[15]研究議題的多元拓展正是這個時期的重要特色之一，以潘佩珠思想研究為例，討論的面向便涉及了人生觀^[16]、民權與民主觀^[17]、時代觀^[18]、世界觀^[19]、知識觀^[20]、本體論^[21]、宗教觀^[22]等範疇，也對1925年後潘佩珠的詩歌創作進行分析。^[23]

但除了諸多議題的開展之外，筆者認為此時的另一個特色，則在於越南學界與國外學界的交流互動，或是探尋潘佩珠在越南國外的文獻資料^[24]，或是介紹翻

[15] 同註3之2，頁752-753。

[16] 高春隆（Cao Xuân Long），「潘佩珠的人生觀及其歷史意義」（“*Tư Tưởng Phan Bội Châu về Con Người và Ý Nghĩa Lịch Sử của Nó*”）（胡志明市：胡志明市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博士論文，2010）。黎玉聰（Lê Ngọc Thông），〈佛教影響到潘佩珠的人生觀〉（“*Ảnh Hưởng của Phật Giáo tới Tư Tưởng của Phan Bội Châu về Con Người*”），《佛學研究》（*Nghiên Cứu Phật Học*），5（2000），頁42-45。

[17] 賴文南（Lại Văn Nam），「潘佩珠的民主思想」（“*Tư Tưởng Dân Chủ của Phan Bội Châu*”）（胡志明市：胡志明市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碩士論文，2006）。阮文和（Nguyễn Văn Hòa），〈潘佩珠的民權觀〉（“*Quan Niệm của Phan Bội Châu về Dân Quyền*”），《哲學雜誌》（*Tạp Chí Triết Học*），9（2008）。

[18] 阮文和，〈潘佩珠對於「時代」的觀念〉（“*Quan Niệm của Phan Bội Châu về 'Thời'*”），《理論生活》（*Sinh Hoạt Lý Luận*），1（1997），頁32-34。

[19] 黎玉聰（Lê Ngọc Thông），「潘佩珠的世界觀」（“*Thế Giới Quan Phan Bội Châu*”）（河內：社會科學及人文大學哲學博士論文，2001）。

[20] 阮文和，〈潘佩珠對於知識在人類生活中之作用的想法〉（“*Tư Tưởng của Phan Bội Châu về Vai Trò của Tri Thức trong Đời Sống Con Người*”），《哲學雜誌》，4（1996），頁32-34。

[21] 阮文和，〈潘佩珠的本體論思想〉（“*Tư Tưởng của Phan Bội Châu về Bản Thể Luận*”），《報刊與宣傳》（*Báo Chí và Tuyên Truyền*），4（1996），頁33-34。

[22] 阮文和，〈潘佩珠的宗教觀〉（“*Quan Niệm của Phan Bội Châu về Tôn Giáo*”），《宗教研究》（*Nghiên Cứu Tôn Giáo*），7（2001），頁51-56。

[23] 阮有智（Nguyễn Hữu Trí），「御津老人時期的潘佩珠詩歌」（“*Thơ Phan Bội Châu Thời Kỳ Ông Già Bến Ngự*”）（河內：河內師範大學語文學科博士論文，1995）。

[24] 如章收在中國、法國，以及日本等地蒐集潘佩珠的著作或相關資料：

1. 〈新發現潘佩珠的一部小說《空中緣》〉（“*Một Tiểu Thuyết của Phan Bội Châu Mới Được Phát Hiện: Không Trung Duyên*”），《文學雜誌》，2（1999），頁79-80。
2. 〈蒐集潘佩珠在法國的資料〉（“*Về Việc Sưu Tầm Tài Liệu Phan Bội Châu tại Pháp*”），《歷史研究》，308（2000.1-2），頁93-96。
3. 〈關於1918年潘佩珠在日的「淺羽佐喜太郎紀念碑」〉（“*Về Tấm Bia Kỷ Niệm Thiển Vũ Tú*”）

譯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25]，或是更自覺地進行跨國界／跨地域的比較^[26]。也有越來越多的越南學者「跨出去」，或是吸引國外學者「走進來」，主辦或是參與各類型的學術研討會或是合作計畫。越南學界透過這些學術交流互動所帶來的刺激與經驗，研究取向也發生轉變與深化，進而將潘佩珠研究拉出了只停留在越南政治與歷史的格局，既開創出多元的議題，也進行不同區域的比較。

但不可諱言的是，目前越南學界的詮釋取向仍以馬克思－列寧社會主義為主，不少研究還是強調站在馬列社會主義或唯物史觀的立場進行潘佩珠的研究，意識形態仍然影響著詮釋的方法與內容。往後如何避免意識型態的干擾、人為政治的設限，又如何有更為整全與前瞻的關懷，以進行典範的轉移，進一步從東亞各區域的互動關係中，看待潘佩珠在東亞的活動及其意義，應是越南學界未來值得思考的課題。

（二）日本、歐美，以及中文學界方面

潘佩珠以日本為東遊運動的根據地，一方面培植人才，一方面向外求援抗

Hỷ Thái Lang (Asaba Sakitaro) của Phan Bội Châu ở Nhật Bản Năm 1918”，《漢喃雜誌》（*Tạp Chí Hán Nôm*），2（2008），頁69-72。附帶一提，章收於2000年修訂《潘佩珠全集》，除了增加新發現潘佩珠的著作或資料外，也補入潘佩珠的漢文著作，漢學界因而能使用《潘佩珠全集》裡的資料，唯內文排印與句讀常有脫誤，在使用上須多加注意。

[25] 同註3之3，頁3-14。又如：

1. 法·Georges Boudarel著，章收、胡雙（Hò Song）譯，《潘佩珠及其當時的越南社會》（*Phan Bội Châu và Xã Hội Việt Nam ở Thời Đại Ông*）（河內：文化與通訊出版社，1997，原書發表於1969）。
2. 〔日〕白石昌也（Siraishi Masaya）著，阮如豔（Nguyễn Như Diễm）、陳山（Trần Sơn）譯，《越南民族運動與亞洲、日本的關係——潘佩珠對於世界革命的思想》（*Phong Trào Dân Tộc Việt Nam và Quan Hệ của Nó với Nhật Bản và Châu Á: Tư Tưởng của Phan Bội Châu về Cách Mạng Thế Giới*）（河內：國家政治出版社，2000，原書出版於1993）。

[26] 舉其要者，如：

1. 永聘（Vĩnh Sinh），〈越南與日本對於國家獨立的觀念：以潘佩珠與福澤諭吉為例〉（“Quan Niệm về Độc Lập Quốc Gia Việt Nam và Nhật Bản: Trường Hợp Phan Bội Châu và Fukuzawa Yukichi”），《歷史研究》，265（1997.11-12），頁17-34。
2. 章收，〈二十世紀初孫中山及中國辛亥革命與潘佩珠及越南革命之間的關係〉（“Mối Quan Hệ giữa Tôn Trung Sơn và cách mạng Tân Hợi Trung Quốc với Phan Bội Châu và Cách Mạng Việt Nam Đầu Thế Kỷ XX”），載於：（越南）中國研究中心（Trung Tâm Nghiên Cứu Trung Quốc）編，《辛亥革命——九十年之後的回顧》（*Cách Mạng Tân Hợi: 90 Năm Nhìn Lại*）（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209-249。
3. 阮進力（Nguyễn Tiến Lực），《潘佩珠在日本的活動（1905-1909）》（*Những Hoạt Động của Phan Bội Châu ở Nhật Bản 1905-1909*）（胡志明市：胡志明國家大學出版社，2008）。

法，而爲了推動東遊運動，他在日本完成或出版了不少的著作。因此，潘佩珠及其所領導的東遊運動，在日本實留下了不少史料文獻，日本官方（如外務省）亦有檔案記錄。所以，在越南學界之外，當屬日本學界對於潘佩珠的研究最具規模。而日人對於潘佩珠著作的逐譯亦早，在1920年代末便有譯著出版^[27]，往後陸續有譯作問世。^[28]雖然以《潘佩珠年表》爲藍本的傳記至1999年才出版^[29]，但日本學界對於潘佩珠的研究已在1960年代展開，如川本邦衛^[30]、寺廣映雄^[31]等人。除了編譯潘佩珠的著作之外，此時學界的焦點大多集中在東遊運動時期的活動狀況及其思維的轉變（如從君主立憲到民主共和），以及他與日本及中國等非政府組織的往來關係，並逐漸呈現出一種以日本爲主的東亞視角。

在川本邦衛等人之後，對潘佩珠研究最力的學者即爲白石昌也。白石昌也在1973年碩士論文的基礎上，進一步對潘佩珠的政治活動與思想變化，及其與日本及亞洲民族運動的關係，展開深入且多層次的考察。^[32]簡言之，白石氏的研究以

[27] 潘是漢（即潘佩珠）記，南十字星譯，〈獄中記〉，《日本及日本人》，臨時增刊179（1929.6），頁129-155。

[28] 如潘佩珠著，南溟生譯，《天か帝か》（上海：南溟會，1932）。日後，大岩誠，《安南民族運動史概説：越南悲史》（東京：ぐろりあ・そさえて，1941）與長岡新次郎、川本邦衛編譯，《ヴェトナム亡国史・他》（東京：平凡社，1966）也都收錄了上述南十字星與南溟生所譯之內容。

[29] 内海三八郎著，千島英一、櫻井良樹編，《ヴェトナム獨立運動家潘佩珠伝——日本・中國を駆け抜けた革命家の生涯》（東京：芙蓉書房，1999）。此書並非《潘佩珠年表》的直接翻譯，而是内海三八郎在越南英明（即吳成人）所贈之《自判》的基礎上，所作的一部關於潘佩珠的傳記。文末附有《自判》一書漢文原文，但在句讀點校上有不少錯誤。

[30] 1. 〈維新東遊期における潘佩珠の思想——ヴェトナム民族運動の起点〉，收入：山本達郎博士古稀記念論叢編集委員会編，《東南アジア・インドの社会と文化》上冊（東京：山川出版社，1980），頁415-439。
2. 〈潘佩珠と保皇派および革命同盟会との関係1——維新東遊期についてみたる〉，《慶応義塾大学言語文化研究所紀要》，12（1979.12），頁25-42。
3. 〈潘佩珠と保皇派及び革命同盟会との関係2——広州事件前後の回想よりみたる〉，《慶応義塾大学言語文化研究所紀要》，13（1981.12），頁51-69。

[31] 寺廣映雄，〈越南初期民族運動をめぐる日本と中国〉，《大阪学芸大学紀要・人文科学》，15（1966.3），頁136-144。

[32] 白石昌也，「ベトナム開明思想の形成とその展開——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を中心に」（東京：東京大學社會學研究科國際關係論碩士論文，1973）。《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對外認識》（東京：巖南堂書店，1993）。這本書是在其發表的多篇論文及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的，相關單篇論文，此不贅錄，詳參拙著，〈潘佩珠研究論著目錄（1950-2010）〉，而越譯本則於2000年出版。

下有幾個特色：首先，是深入而謹慎地運用各種史料。白石氏廣泛地使用各種資料，除了潘佩珠的著作之外，還參考了大量的官方檔案、鄉土史料、回憶錄、報刊，並吸收西方、越方，以及日本的研究成果。在史料的梳理與判讀上，不但較為細緻嚴謹，同時也能抉發文本表面之下的豐富意涵，並給予合理的解釋。^[33]其次，是他的研究視角也突破過去研究潘佩珠，大多只從「越日關係」或是「越中關係」著手的局限，而是將其關懷延伸至東亞，以東亞整體視角看待潘佩珠與當時東亞之日本、中國、法屬越南政府之間的多層互動關係，關注彼此之間的交流影響。再次，是不割裂潘佩珠的生命階段，擺脫以往只針對潘佩珠某一生命階段進行研究的情況，並與越南民族運動不同世代互相連結，在重視歷史連續性脈絡的狀況下，試圖建構潘佩珠之政治活動與思想轉變的完整歷程。^[34]以上這些特色，使得他的研究呈現多度時空的縱深，在討論潘佩珠一生的政治活動與思想轉變時，同時也探討了在法國殖民之下，越南民族運動的過程與樣態，並觸及近代東亞民族運動的動向與發展，展現其它學者頗難達到的廣深與深度。雖然，近年來白石昌也的研究關懷轉向現代越南與中南半島的政經情勢，但此書仍是研究潘佩珠的重要著作之一。

在白石昌也之後，陸續有今井昭夫探討潘佩珠與社會主義關係，或是他在順化時期的思想。^[35]又如留學日本的阮進力，則是致力於日本越南兩國關係史的討論，他關注包括潘佩珠在內的越南知識人心中的「日本形象」，是如何形成與建構的，又是如何影響越南的民族運動。^[36]而此時日本學界的潘佩珠研究的另一

^[33] 例如白石昌也不滿於學界常毫無考證批評，就接受潘佩珠在兩本自傳裡所描述的內容。他認為除了有記憶混亂導致所述內容與事實不符的因素之外，亦有潘佩珠為了維護自身立場，而隱藏或竄改不利於自身的事實／記憶，以達到自我辯護的目的，而這也是一般自傳或回憶錄常見的狀況。同前註，見頁15、444-445。而白石氏對於史料詳細的整理對照，從此書的附錄一〈出洋ベトナム人一覽表〉即可見一斑，詳見頁743-776。

^[34] 但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白石氏研究的重點仍然放在潘佩珠渡日前後之政治活動與思想形成上，對於潘佩珠在東遊運動結束後之生涯的討論顯得較為薄弱，只集中在潘佩珠與越南光復會、提倡法越提攜等事件上。

^[35] 1. 〈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社会主義」をめぐる〉，《東京外国語大学論集》，45（1992.11），頁237-250。

2. 〈フエ時代の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思想〉，《東京外国語大学論集》，54（1997.3），頁61-72。

3. 〈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日本滞在経験とその思想形成（資料紹介 東遊運動100周年記念学術交流会議に参加して）〉，《東京外大東南アジア学》，11（2008），頁80-86。

^[36] 1. 〈Phan Boi Chauの日本観〉，《広島大学東洋史研究室報告》，16（1994）。

項特色，就是熱衷於發掘越人在日的新史料或相關遺跡，其中又以淺羽佐喜太郎（1867-1910）與潘佩珠或其它東遊志士的往來最受注目，因淺羽曾於東遊運動低潮時給予越人極大援助，潘佩珠以「義俠」許之，並於1918年為其建紀念碑。但淺羽對越南人的援助曾經是敏感的話題，再加上時間漸久，已有許多事跡或資料湮沒在歷史的角落。因此，不少研究者試圖重建當時兩人往來的情形，以填補過去的空白，並證明淺羽（日本）與越南之友好。^[37]

而西方學界較早進行潘佩珠研究的是法人Georges Boudarel（1926-2003），他在1960年代末期發表了三篇與研究潘佩珠有關的著作。一是將《潘佩珠年表》譯成法文，這個版本運用當時法國外交部與殖民政府的檔案資料，改正不少年表裡的錯誤，而獲得研究者的好評。^[38]一是關於1954年以來北越研究潘佩珠的書目，回顧1954-1969年越南學界對於潘佩珠的研究情形。^[39]另一篇著作是在文獻整

2. 〈19世紀後半～20世紀初頭のベトナム知識人の日本近代化観〉，《広島東洋史学報》，1（1996.11），頁51-62。

3. 〈20世紀初頭のベトナム知識人の『国民国家』観の形成に関する一考察——在日期の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国民国家」観の形成過程を中心に〉，《広島東洋史学報》，2（1997.12），頁17-30。上述這些論文亦收錄於其博士論文「ベトナム・日本関係史の研究——明治維新から太平洋戦争まで」（廣島：廣島大學大学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論文，1999）。

^[37] 較早的討論有：

1. 柴田靜夫，〈ベトナム独立運動の亡命者を助けた浅羽佐喜太郎〉，《磐南文化》，1（1979），頁25-27。

2. 富田春生，〈墓と記念碑——東遊運動が残したもの〉，《南方文化》，12（1985.11），頁189-203。

而日越雙方曾於2003年於日本靜岡縣袋井市舉行盛大的「淺羽佐喜太郎公紀念碑建立八五周年紀念會」，其活動內容參見<http://www.asaba.or.jp/machiokosi/vietnam/index.htm>（上網時間：2011.3.13），此次活動成果則集結成安間幸甫編，《淺羽佐喜太郎と東遊運動：指導者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と地域が伝える》（靜岡：淺羽佐喜太郎公紀念碑建立八五周年記念事業実行委員會，2003）一書。近日則有柴田靜夫，《報恩の碑：義侠の医師浅羽佐喜太郎と潘佩珠》（東京：菁柿堂，2009）與田中孜，《日越ドンズーの華——ヴェトナム独立秘史 潘佩珠の東遊（＝日本に学べ）運動と浅羽佐喜太郎》（東京：株式会社明成社，2010）二書。

^[38] Georges Boudarel (trans.), "Mémoires de Phan Bội Châu," *France-Asie/Asia* 22:3/4(1968), pp.3-210.白石昌也認為這是當時歐美學界裡最為詳盡的著作，見同註32，頁10。陳慶浩先生亦有相似的看法，見氏著，〈從新發現潘佩珠（1867-1940）的漢文小說談漢文化整體研究〉，載於：王三慶、陳益源主編，《2007東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樂學書局，2007），頁2。

^[39] Georges Boudarel, "Bibliographie Des Œuvres Relatives À Phan Bội Châu Éditées En Quoc Ngã À Hanoi Depuis 1954,"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56(1969), pp.157-176.

理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潘佩珠與同世代進行越南民族運動者的活動歷程，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以描繪二十世紀初期越南民族運動的整體樣貌。^[40]

在Georges Boudarel之後，西方學界對於潘佩珠的討論，基本上也是分為兩條路線進行：首先，在潘佩珠相關文獻的整理上，有兩部關於潘佩珠自傳的翻譯^[41]，其中又以越籍加拿大學者永聘翻譯的水準較高，他不僅注意到不同版本的差別，也吸收了法譯本以及國際間較重要的成果。^[42]其次，有David G. Marr^[43]、William J. Duiker^[44]等人介紹潘佩珠及其以他為首的組織與活動歷程，將潘佩珠置於越南反殖民族運動的整體歷史脈絡之中，雖然潘佩珠領導的運動最終失敗，但其愛國熱情與奉獻犧牲的精神，對於越南民族運動仍有很大的影響，這些看法與北越學界的觀點較為相近。之後陸續有Jörgen Unselt^[45]、永

^[40] Georges Boudarel, "Phan Bội Châu Et La Société Vietnamienne De Son Temps," **France -Asie/Asia** 23 :4(1969), pp.354-436.此書後由章收、胡雙兩人譯成《潘佩珠及其當時的越南社會》（*Phan Bội Châu và Xã Hội Việt Nam ở Thời Đại Ông*）（河內：文化與通訊出版社，1997）一書。

^[41] David G. Marr (ed.), *Reflections from Captivity: Phan Bội Châu's Prison Notes & Ho Chi Minh's Prison Diary*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8) (trans. by Christopher Jenkins, Khánh Tuyết Trần, Sanh Thông Huỳnh). 此書合譯了潘佩珠的《獄中書》與胡志明的《獄中日記》。Vinh Sinh & Nicholas Wickenden (trans.), *Overtaken Chariot: The Autobiography of Phan Bội Châ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42] 詳見同註38，陳慶浩先生論文，頁2。

^[43] David G. Marr, *Vietnamese Anticolonialism 1885-192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98-155.

^[44] William J. Duiker,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Vietnam, 1900-1941*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31-50.在此之前作者發表了 "Hanoi Scrutinizes the Past: The Marxist Evaluation of Phan Bội Châu and Phan Chu Trinh," *Southeast Asia* 1:3 (1970), pp.242-254. "Phan Bội Châu: Asian Revolutionary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1(1971), pp.77-88.前者討論潘佩珠與潘周楨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看法，後者探討潘佩珠在越南民族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面臨的困境。

^[45] Jörgen Unselt, *Viet Nam: Die Nationalistische und Marxistische Ideologie im Spätwerk von Phan Bội Châu(1867-1940)*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80). 作者試圖分析潘佩珠晚年思維裡民族主義與馬克思思想。然而，除了少數學者（如章收）承認潘佩珠晚期帶有較明顯社會主義色彩之外，大部分學者並不認為潘佩珠晚年的思維轉向馬克思或社會主義思想，而其作品裡（如《范鴻泰傳》或《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色彩，更有可能是源自儒家「大同」思想。相關討論亦多，主要可參見同註2，頁326-327，以及同註35之1，頁237-250。

聘^[46]、阮世英（Nguyễn Thế Anh）^[47]、Yves Le Jariel^[48]等人分別從馬克思主義、東遊運動、自傳體裁、民族主義等角度展開對潘佩珠專題式的討論。^[49]

而中文學界對於潘佩珠的探討，除了潘佩珠生平的概說之外^[50]，大多圍繞在作品的介紹賞析^[51]、《越南亡國史》的著作權爭議及傳播情形^[52]、潘佩珠及越

^[46] Vinh Sinh (ed.). *Phan Bội Châu and the Đông-Du Movement* (New Haven: Yal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1988). 此書集合了幾位研究潘佩珠的學者如阮世英（Nguyễn Thế Anh，越籍法人）、古田元夫（日）、白石昌也（日）、永聘、黃生聰（Huỳnh Sanh Thông，越）、阮克堪（Nguyễn Khắc Kham，越）等人對於潘佩珠與東遊運動不同層面的探討，概論與專論兼具，書末附有研究書目，亦具參考價值。而全書以英法文撰寫，企圖增進西方學界對於潘佩珠及東遊運動的了解。

^[47] 阮世英從潘佩珠的回憶錄，探討越南文學中自傳體裁的內容與發展，分別以越、英、法等文發表，如“Phan Bội Châu's Memoirs and the Autobiographical Genre in Modern Vietnam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Melbourne) 5(1992.1), pp. 35-43.

^[48] Yves Le Jariel, *Phan Bội Châu(1867-1940): Le Nationalisme Vietnamien Avant Ho Chi Minh* (Paris: L'Harmattan, 2008).

^[49] 此外，章收在〈近年來關於國外研究潘佩珠的情形〉一文提到蘇聯（今俄羅斯）的A. Vôrônhin、A. Niculin和東歐波蘭的Edwrad Maliki等人有介紹或進行潘佩珠的研究。但作者並未註明相關成果之原文名稱與出版訊息，見頁8。筆者透過網路及資料庫查詢亦無下落，暫誌於此，待日後搜尋。

^[50] 舉其要者，如：

1. 徐善福，〈潘佩珠研究（上）（下）〉，《暨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4（1980），頁34-45、35-43轉34。
2. 王民同，〈越南民族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潘佩珠〉，《雲南師範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報》，24：2（1992.4），頁51-55。
3. 于在照，〈潘佩珠〉，載於：黃心川主編，《東方哲學家評傳·越南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頁250-266。

^[51] 1. 陳玉龍，〈鯤鵬羈樊籠重賦《正氣歌》——越南近代革命先驅潘佩珠漢文五言古詩一首詮釋〉，《東南亞縱橫》，2（1983），頁49-51。
2. 楊天石，〈潘佩珠與中國——讀越南《潘佩珠自判》〉，《百年潮》，10（2001），頁67-73。
3. 陸凌霄，〈富於現代小說氣息的《後陳逸史》〉，載於：氏著，《越南漢文歷史小說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頁247-276。

^[52] 1. 黃國安，〈《越南亡國史》是梁啟超撰寫嗎？〉，《東南亞縱橫》，1（1991），頁36-38。
2. 徐善福，〈關於《越南亡國史》的作者問題〉，《東南亞縱橫》，3（1992），頁35-37。
3. 周佳榮，〈梁啟超與《越南亡國史》——近代中越關係史上的一段插曲〉，載於：氏著，《新民與復興——近代中國思想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7），頁82-93。
4. 梁志明，〈梁啟超與《越南亡國史》〉，載於：戴可來、于向東，《越南歷史與現狀研究》（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頁255-258。
5. 鄒振環，〈梁啟超、潘佩珠的《越南亡國史》及其在中國和朝鮮的傳播與影響〉，《韓國學研究論叢》1（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頁308-318。

南革命與梁啟超、孫中山及中國革命的關係等幾個主題上。^[53]與其他學術社群相較，中文學界對於潘佩珠的研究仍強調其與中國的互動關係。^[54]換言之，潘佩珠在中國之外的樣貌，並非中文學界感興趣或是有能力處理的議題。^[55]因此，無論是在數量還是質量上，中文學界對於潘佩珠的研究仍有值得開拓的空間。唯近日開始有研究者注意到潘佩珠與東亞知識人的互動，探討知識人之間的思維傳遞與相互影響^[56]，以及一批新發現潘佩珠所著的漢文小說^[57]，隨著學術視角的轉移與新材料的整理公布，相信未來中文學界對於潘佩珠的研究，能展現出與其他學術社群不同的面貌，並達到更高的學術水準。

三、新材料與新視角：以潘佩珠漢文小說的研究為例

如前文所述，學界對於潘佩珠的研究已積累出豐厚的研究成果，而潘佩珠研究在不同的時代潮流之下，亦有不同的面貌與課題。隨著學術思潮的改變與典範的轉移，以及對於學術研究的精細要求，如何另闢新徑，是許多研究者一再尋覓苦思的問題。學術研究的源頭活水往往倚賴於新發現或新出土的材料，或是改變原有的研究視角、創新研究的觀點，抑或是進行跨領域／跨學科／跨地域的研究，而「潘佩珠漢文小說研究」，又是否能達到這些學術要求與期待，則是需要進一步說明的。

^[53] 1. 于在照，〈潘佩珠與孫中山〉，《東南亞》，4（2006），頁44-48。

2. 蔣永敬，〈孫中山與潘佩珠〉，載於：氏著，《孫中山與中國革命》（臺北：國史館，2000），頁421-456。

^[54] 目前僅有劉先飛根據《潘佩珠年表》的紀錄，探討潘佩珠對日觀的轉變過程，詳見氏著，〈東遊運動與潘佩珠日本認識的轉變〉，《東南亞研究》，5（2011），頁69-73。

^[55] 即使是在中國留學的越南研究生有能力處理相關的問題，但因為學術環境與論文選題的關係，而在論述上提到或是強調中越關係與影響。詳見：

1. 〔越〕吳雪蘭，「19世紀末20世紀初越南進步士大夫思想轉變之探討」（北京：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4）。

2. 〔越〕阮秋賢，「中國維新運動對越南維新運動的影響」（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碩士論文，2002.5）。

^[56] 1. 陳益源、羅景文，〈越南潘佩珠與日本、中國之深厚關係——以潘佩珠對於西方建國英雄事蹟的吸收與轉化為例〉，《漢學研究學刊（馬來亞大學中文系）》，1（2010.10），頁119-141。

2. 羅景文，〈東亞漢文化知識圈的流動與互動——以梁啟超與潘佩珠對西方思想家與日本維新人物的書寫為例〉，《臺大歷史學報》，48（2011.12），頁51-96。

^[57] 同註38，陳慶浩先生文，頁1-14。

(一) 新材料的發現

透過文獻回顧，我們可以發現歷來研究的重心大致著重於潘佩珠的政治活動與思維傾向，以及他在越南反殖民民族運動歷程中的所扮演的角色與歷史定位。相較之下，學界對其文學創作的探討，則顯得較為薄弱，主要集中在「詩文」體裁，而論述也多以通論性之詩文譯介的方式呈現^[58]，專論或主題式的探討並不多見^[59]，在詮釋上亦偏重於發掘其詩歌文章中的愛國熱情與革命思想。^[60]若集中於學界對其（漢文）小說的探討，則更顯得鳳毛麟角，越南學界目前僅有章收為幾部收入《潘佩珠全集》（2000年再版）的小說撰寫前言介紹，這些小說有《重光心史》（或稱《後陳逸史》）、《空中緣》（或稱《安琪兒》）、《嚼菜禪師》、《真將軍》、《再生生》、《豬王本紀》等六部小說。^[61]但就筆者目前所見，這些小說似乎不是越南學界關心的議題，也未有研究者展開專題研究。就中文學界來說，亦僅有陸凌霄、任明華等人探討《後陳逸史》一書而已。^[62]而他們之所以只討論《後陳逸史》^[63]，肇因於中文學界過去只發現整理這部小說。至於日本或西方學界迄今未見有任何相關研究成果。

由此可知，潘佩珠的漢文小說長久以來未被關注，最主要原因在於許多材料尚未被發現，而已經被發現的材料也因為語文的隔閡和視角的局限，未能得到

[58] 如同註7。又如：

1. 懷清 (Hoài Thanh)，《潘佩珠——生平及其詩文》（*Phan Bội Châu- Cuộc Đời và Thơ Văn*）（河內：文化出版社，1978）。
2. 陳英榮 (Trần Anh Vinh)、章收，《潘佩珠在1926-1940年時期的詩文》（*Thơ Văn Phan Bội Châu Thời Kỳ 1926-1940*）（順化：順化出版社，1987）。

[59] 1. 阮光蘇 (Nguyễn Quang Tô)，「從潘佩珠的詩文論其救國與革命精神」（“*Tinh Thần Cứu Quốc và Cách Mạng của Sào Nam Phan Bội Châu qua Thi Văn của Cụ*”）（西貢：文科學碩士論文，1974）。

2. 阮有智 (Nguyễn Hữu Trí)，「御津老人時期的潘佩珠詩歌」（“*Thơ Phan Bội Châu Thời Kỳ Ông Già Bến Ngự*”）（河內：河內師範大學語文學科博士論文，1995）。

[60] 如前述鄧泰梅與阮光蘇的著作，又如黎文叢 (Lê Văn Tùng)，〈對於潘佩珠詩文喚醒革命之相關問題的一些初步看法〉（“*Mấy Ý Kiến Bước Đầu về Vấn Đề Sự Thức Tỉnh Cách Mạng trong Văn Thơ Phan Bội Châu*”），《義安師範大學學報（語文版）》（*Thông Báo Khoa Học, Phần Ngữ Văn, Đại Học Sư Phạm Vinh*），1983。

[61] 詳見章收編，《潘佩珠全集》第4冊（順化：順化出版社、河內：東西語言文化中心，2000），各小說「前言」。亦可參見同註3之2，頁254-297。

[62] 同註51之3。任明華，《越南漢文小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314-321。

[63] 〔越〕范文深點校，《後陳逸史》，載於：陳慶浩、陳義、鄭阿財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2輯第3冊，頁285-375。

充分的利用。這樣的情形直到陳慶浩先生新發現一批潘佩珠的漢文小說才有所改變。陳先生於2007年3月24日成功大學中文系主辦「東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以主題演講「從新發現潘佩珠（1867-1940）的漢文小說談漢文化整體研究」向學界報告在《兵事雜誌》新發現潘佩珠的漢文小說。陳先生在這次報告中提到潘佩珠之生平及著作情形，以及他撰寫小說時所署的筆名，並初步介紹潘氏創作的漢文小說。^[64]之後應上海師範大學孫遜教授之邀，共同組成一研究與整理東亞漢文小說的合作團隊，計畫整理出版包含潘佩珠漢文小說在內的越南，乃至於日本、韓國、傳教士等漢文小說。^[65]這些新資料的整理公布，相信將帶來另一波潘佩珠研究的熱潮。而就目前所知，可能歸屬於潘佩珠在《兵事雜誌》上所發表的漢文敘事作品即有以下二十部：

可能為潘佩珠創作、翻譯之敘事作品一覽表（依發表時間先後順序排列）^[66]

編號	名稱	署名狀況	《兵事雜誌》刊載期數、時間（年.月）
1	（革命外史） 嚼菜禪師	天賦	第39期（1917.7）
2	（冒險小說） 國外國	愚叟述 天賦譯	第40期（1917.8）—第41期（1917.9）
3	真將軍	天賦	第41期（1917.9）—第43期（1917.11）
4	再生生	南山愚叟述、 天賦譯	第54期（1918.10）
		浩生	第55期（1918.11）—第57期（1919.1）
5	余愚識	南山愚叟述、 天賦譯 ^[67]	第54期（1918.10）、第56期（1918.12）、 第58期（1919.2） ^[68] （未完）
6	重光心史	bG（或作BG） 著、憲漢譯	第81期（1921.1）—第84期（1921.4）、 第88期（1921.8）—第95期（1922.3）、 第130期（1925.2）—第133期（1925.5） ^[69]

^[64] 此次報告內容收入同註38，頁1-14。

^[65] 其中《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由孫遜、鄭克孟、陳益源等人主編，2010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而於2011年3月發表新書。

^[66] 本表參考陳慶浩，〈從新發現潘佩珠（1867-1940）的漢文小說談漢文化整體研究〉，見頁9-10。樽本照雄編，《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濟南：齊魯書社，2002，下文簡稱《樽本目》）。劉永文編，《民國小說目錄（1912-19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下文簡稱《劉目》）。

^[67] 第58期則於「天賦譯」三字上方，以雙行小字署「南山叟述」。

^[68] 《樽本目》、《劉目》著錄刊載期數為「54-58期」（1918.10-1919.2），頁908；72。

^[69] 《樽本目》、《劉目》著錄刊載期數為「81-133期」（1921.1-1925.5），頁963；72。

編號	名稱	署名狀況	《兵事雜誌》刊載期數、時間（年.月）
7	赤俄偉人列寧、多刺奇二人略傳	天賦	第82期（1921.2）—第83期（1921.3）（未完） ^[70]
8	空中緣	天賦	第86期（1921.6）—第87期（1921.7）
		憲漢	第96期（1922.4）—第100期（1922.8）、第103期（1922.11）、第106期（1923.2）、第108期（1923.4）—第109期（1923.5）、第111期（1923.7）、第114期（1923.10） ^[71]
9	戰場之曙光	憲漢	第101期（1922.9）
10	血紙	憲漢	第102期（1922.10）、第104期（1922.12） ^[72]
11	俠狗	憲漢	第105期（1923.1）
12	豬王本紀	憲漢	第107期（1923.3）
	義狸奴	KB著、憲漢譯	第110期（1923.6）
	猿國	BA著、憲漢譯	第112期（1923.8）—第113期（1923.11）、第115期（1923.11）—第116期（1923.12）、第120期（1924.4） ^[73]
	歡送豬王記	憲漢	第117期（1924.1）
	死之義	（法）PAUL BOURFET著、憲漢譯	第118期（1924.2）—第119期（1924.3）
	俠水軍	法人著、憲漢譯	第121期（1924.5）、第123期（1924.7）—第126期（1924.10）、第128期（1924.12）—第129期（1925.1） ^[74]
	義鳩	憲漢	第127期（1924.11）、第134期（1925.6）—第135期（1925.7） ^[75] （未完）
	萬里逋逃記	憲漢	第136期（1925.8）—第142期（1926.2）、第145期（1926.5）、第147期（1926.7） ^[76] （未完）
	劫後軍人	憲漢	第146期（1926.6） ^[77]

《兵事雜誌》刊載期數、時間（年.月）

學界直到陳慶浩先生整理公布這些漢文小說，才知道在潘佩珠在革命活動與詩文創作之外，亦為一創作頗豐的小說家。上表這些作品都發表於《兵事雜誌》

^[70] 此文未完，目前所見僅略述列寧事蹟，而未述及多刺奇。

^[71] 《樽本日》、《劉目》著錄刊載期數為「86-110期」（1921.6-1923.3），頁374；72。

^[72] 《樽本日》著錄刊載期數為「101-104期」（1922.9-1922.12），頁840。《劉目》著錄刊載期數為「102-104期」（1922.10-1922.12），頁73。

^[73] 《樽本日》、《劉目》著錄刊載期數為「112-120期」（1923.8-1924.4），頁922；73。

^[74] 《樽本日》、《劉目》著錄刊載期數為「121-129期」（1924.5-1925.1），頁766；73。

^[75] 《樽本日》、《劉目》著錄刊載期數為「127-134期」（1924.11-1925.6），頁879；73。

^[76] 《樽本日》、《劉目》著錄刊載期數為「136-142期」（1925.8-1926.2），頁718；73。

^[77] 《樽本日》、《劉目》未錄。

「小說」欄之中，的確為研究潘佩珠增添不少新材料。不過，上表中某些被冠以「小說」的作品，其文體是否屬於「小說」仍有疑義^[78]，如陳先生便認為有些作品其實是「人物傳記或見聞實錄」，「而非我們目前所指的小說」^[79]，再加上某些作品是潘佩珠的譯作（或是改頭換面的「襲作」^[80]），而非個人創作，這使得上述小說的著作權仍有一些模糊地帶。^[81]雖然《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20冊《潘佩珠漢文小說集》已經點校出版，給予學界莫大的便利，但在小說的收錄標準上仍不無疑義。^[82]因此，對於潘佩珠漢文小說的基礎文獻問題仍待考訂整理，需要在嚴謹定義下，確定潘佩珠漢文小說的數量和篇目，並給予妥當的考辨，以利後續研究的進行。期待透過新發現材料的整理研究，提供學界對於潘佩珠及其漢文小說更為深入的認識與了解，以突破學界過去研究潘佩珠時，著重其政治活動與意識型態的視角與框架。

[78] 這牽涉到「小說」的定義問題，究竟這裡所指的「小說」，是中國傳統的小說觀念（其實也很含混駁雜），還是現代西方的小說觀念，或是如梁啟超所言：「似說部非說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論著非論著，不知成何種文體，自顧良自失笑」的「小說」觀，而這些看法又要如何篩選去取、調和涵攝，的確是個頗費思量的問題。引文見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緒言》，載於：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1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38。

[79] 陳慶浩先生初步認定有十六部可以算是潘氏的漢文小說（含譯作）：《國外國》、《再生生》、《余愚識》、《重光心史》、《空中緣》、《血紙》、《俠狗》、《豬王本紀》、《義狸奴》、《猿國》、《歡送豬王記》、《俠水軍》、《義鳩》、《萬里逋逃記》、《死之義》，見〈從新發現潘佩珠（1867-1940）的漢文小說談漢文化整體研究〉，頁9-10。唯慶浩先生在編輯《越南漢文小說集成》時又增加了《嚼菜禪師》、《真將軍》、《戰場之曙光》、《劫後軍人》等四部小說，而前兩者則屬於「人物傳記」。

[80] 如《俠水軍》與《死之義》即襲自越南《南風雜誌》所刊載之漢文小說。除此之外，《萬里逋逃記》亦有雜抄多書的痕跡，關於這些作品的來歷，筆者將於另文詳細討論，此不贅述。

[81] 此外，另有研究者認為《滄桑淚史》極有可能為潘佩珠所作，如郭妍伶，〈《滄桑淚史》初探〉，《東亞文化研究》7（香港：東亞文化出版社，2005），頁209-226。然而，根據相關資料可以排除這種可能性，像這種容易被誤認為潘佩珠的漢文小說，也需要加以考訂。

[82] 除了「小說」定義而導致收錄標準不同的問題之外，又如《俠水軍》為潘佩珠襲自《南風雜誌》中《紅印子傳》之作，改動之處甚少，不應列為潘佩珠漢文小說之作。而《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19冊《〈南風雜誌〉漢文小說集》已收錄《紅印子傳》，卻又在第20冊《潘佩珠漢文小說集》中收錄《俠水軍》。如此一來，不僅重複收錄，也容易讓讀者混淆。而另一部《死之義》亦襲自《南風雜誌·死之義》，然編者為方便讀者對照，將兩篇《死之義》同錄於第20冊《潘佩珠漢文小說集》，此亦容易讓讀者誤解兩部皆為潘佩珠之作。雖然編者已在提要裡說明上述兩部小說的相關狀況，但統統收錄至《潘佩珠漢文小說集》，似為不妥。不過，《重光心史》與《後陳逸史》雖為同一部小說，但兩者在版本與論述上有所差異，的確有兼收兩者的必要性。

（二）新視角的運用

進一步閱讀潘佩珠的漢文小說，我們可以發現，相較於以往的越南漢文小說，乃至於東亞漢文小說，潘氏漢文小說對於社會現實與時代狀態有更為廣闊多元的關懷與互動：如《余愚識》、《空中緣》、《歡送豬王記》，以及《猿國》等小說則提出對挾西方文明之殖民者的批評，殖民者常以一種看似文明的野蠻手法對待被殖民者，潘佩珠在小說中多斥為「偽文明者」。又如《俠狗》、《義狸奴》、《義鳩》，以及《猿國》等篇，內容集中歌頌動物相較於萬物之靈的「人」所豁顯的情義，並藉此辯證物種乃至於人種之間的隔閡畛域是否應該存在之問題。再如《國外國》、《余愚識》、《戰場之曙光》、《豬王本紀》、《義狸奴》等小說則揭露專制者之幽閉封建，以及為了滿足個人權力欲望所帶來的殺戮犧牲。或如《余愚識》、《空中緣》、《戰場之曙光》、《血紙》、《猿國》等小說則深刻反思戰爭所帶來無謂犧牲，並表達對人道的渴望與關懷。而《嚼菜禪師》、《真將軍》、《再生生》、《重光心史》等作，不僅介紹越南英雄志士抗法的事蹟與歷程，也試圖喚起新一代的抗法英雄。至於《國外國》與《猿國》兩篇小說，則分別從不同層次呈現潘佩珠心中的「烏托邦」追求。

由此可知，潘佩珠漢文小說的書寫創作，及其所蘊含的新穎議題，實與近代東亞歷史變革、政治局勢、思潮演變、知識流動，以及媒體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以往透過「政治」、「文學」、「歷史」之單一視角，或是「影響——接受」、「主體——客體」等研究框架，實已無法滿足此融攝重層複雜之互動關聯的研究論題。潘佩珠漢文小說身處於文學、文化與社會等多元系統所共同構築的一個潛力無窮的互動網絡。因此，在分析文本的過程中，應引入文化、歷史、社會等要素，在更為宏觀廣闊的文化脈絡、歷史語境與社會場域裡，觀察並理解文學現象的形成與變遷，以抉發文本的多重意義。我們可進一步從以下三個角度觀察潘佩珠及其漢文小說之書寫創作所具有的豐富的文化社會意涵。

首先，研究潘佩珠的漢文小說將能抉發作者生命與精神的不同面貌，對於潘佩珠的生命歷程與情感思想能有更完整全面的認識。世人對於潘佩珠的認識，大都奠基於他的反殖民民族運動之上，著重他的政治活動與歷史定位，卻往往有意無意地忽略他的文學創作，而這已經成為學界固定的研究思路與論述框架。實際上，在他的漢文小說裡，呈現出「憂國之嘆」與「興國之想」雙重主調。小說中的人物，或許是不斷抵抗的英雄，又或許是一再企求烏托邦／新越南的追尋者，這些都是他生命不同型態的寫照。而在他的熱情之外，也讓我們看到現實的冷酷

困境，小說裡的熱情、失望、頹喪、挫敗、妥協、奮起，不斷交織纏繞出這一位越南民族英雄的複雜心緒。因此，潘佩珠漢文小說的探析，這不僅能直探其情感與思想之核心，揭示其獨特的文學價值與文化意義，同時也能與其政治活動和意識型態相互照映。換言之，研究視角的轉換、文學生命的加入，得以建立潘佩珠多元立體的生命型態與情感面向，而人們對於潘佩珠也將有更為整全的認識與理解。

其次，潘佩珠的漢文小說不僅是研究越南漢文學、漢文小說，亦是中國近代報刊小說的新課題。雖然已有研究者關注到潘佩珠在越南漢文學史的成就與地位，但如此豐富的漢文小說材料，還是第一次進入學界的視野之中。由於潘佩珠是越南漢學最後的大家^[83]，他的小說則是越南漢文小說史上的絕響，並具有總結越南漢文小說史的歷史意義。因此，這個議題的討論在越南漢文學／漢文小說的研究上有其價值。而另一個切入觀察潘氏漢文小說的角度，便是將其置於中國近現代報刊小說的脈絡之中。潘佩珠不僅創作小說，同時也擔任《兵事雜誌》編輯一職^[84]，其漢文小說的生產與傳播過程，不僅與《兵事雜誌》的讀者定位有關，同時也和中國近現代報刊的發展脈動相關。歷來研究者對於中國近現代報刊的研究多集中於幾種指標性的文藝性雜誌。^[85]相較之下，學界對於其他非文學性雜誌的研究頗為冷落，因此潘佩珠漢文小說之創作、傳播，及其與媒體互動的過程，可以說是中國近現代報刊研究的另一議題，將有助於探索歷史變局、傳播媒體與文學藝術之間的複雜關係。

再次，潘佩珠對漢文小說的書寫創作，正是東亞知識人進行選擇、吸收、轉

[83] 如胡玄明便認為：「潘（佩珠）氏乃越南最後之漢學大家，猶如行將熄滅之燈，最後又重發光芒，一閃即滅。潘氏死後，漢字亦因之告別越南文壇矣。」見氏著：「漢字對越南文學之影響」（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2.6），頁102-103。

[84] 潘佩珠曾說：「予友林亮生先生任杭州《軍事雜誌》總理，以書招予來杭。……予得林書，離北京回杭，任《軍事雜誌》編輯員。雜誌中時評、社會、小說等欄，皆予編撰。予是時又成為小說家矣。」引文中《軍事雜誌》即是《兵事雜誌》，見氏著，《潘佩珠年表》（漢喃研究所藏，編號Vhc.2138），原書無頁碼。

[85] 陳平原：「對於那些不僅足以代表『一個時代』，而且可以稱得上『創造了』一個時代的雜誌，如《時務報》、《新民叢報》、《新青年》等，學界已經給多了足夠的重視。至於像《新小說》、《禮拜六》、《小說月報》、《創造》、《現代》、《論語》等著名的文學雜誌，近年更是成為碩士論文、博士論文考察的重點目標。」〈現代中國文學的生產機制及傳播方式——以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報章為中心〉，載於：氏著，《文學的周邊》（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頁130。

化、重組等一連串關於建構自身知識系統的思維活動，其漢文小說也吸納融混著中西日越的多方影響，並隨著現實處境的轉換更迭，展現出相應的面貌。這反映了潘佩珠及其漢文小說與近代東亞歷史變革、政治局勢，以及文化思潮的多方交會與互動，在區域內呈現出複雜多元的互動關聯。因此，進行潘佩珠漢文小說的研究，也有助於理解近代東亞知識人與知識圈彼此往來互動的樣態。

過去由於資料的未被發現、研究者的習見、意識型態的干擾，以及學術領域的細緻分工，使得研究者不容易針對潘佩珠的漢文小說，展開廣闊全面而深入細緻的探討。但如上所述，無論是從基礎文獻的考訂整理、建構作者整全生命歷程與多重樣貌、還是在越南漢文學史／小說史與中國近現代報刊發展中的定位，以及潘佩珠與東亞知識人的交流互動等角度來看，「潘佩珠漢文小說研究」這個議題在文獻材料的生新、研究觀點的創新，以及跨學科領域的整合上都有其價值與意義，值得深入探析。

四、結語

在回顧各學術社群對於潘佩珠的研究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各社群的研究各有其偏重之處，越南與西文學界較著重在越南反殖民運動脈絡裡，潘佩珠與同世代的民族運動者的歷史定位與意義。而日本與中文學界的研究傾向大致相同，都是從自身的研究取向出發，思考日本或中國對於潘佩珠及越南民族運動的影響與作用，或是強調彼此之間的關係，而形成「中越——越中」、「日越——越日」這種互動取向。相對於日本學界，中文學界這種傾斜更為嚴重，如何不只將眼光放在自己身上，而具有開放的視野與前瞻的關懷，是未來進行相關研究時應該深思的問題。此外，幾位因學術訓練與語言優勢，而能跨越不同學術社群的研究者，如白石昌也、永聘等人，能免除資料的隔閡與語文的局限，取徑其他學術社群的研究方法，吸收他人的優勢，而有較他人新穎開放的議題與研究成果，此亦值得我們參考借鏡。

總而言之，學界對於潘佩珠的研究已積累出豐厚的研究成果，研究者如何另闢新徑，以面對學術思潮的改變與典範的轉移，以及對於學術研究的精細要求，進一步拓展與深化潘佩珠的研究？潘佩珠漢文小說的研究應是一個可行的議題，相信潘佩珠的漢文小說不僅能提供東亞漢文小說研究的新材料，也能成為探索作家之生命歷程與精神樣貌，及其與近代東亞歷史發展、知識人與知識圈之互動的重要例證，有助我們觀察近代東亞文學、文化與社會等多層面的互動與對話，展

現潘佩珠之漢文小說獨特的社會文化意義。

致謝

本文承蒙審查意見惠賜審查意見，讓筆者得以釐清相關問題、調整論文架構，並進一步思考研究方法的適切性，謹致謝忱。同時感謝陳慶浩先生所給予的諸多支持與指導，在此一併致謝。

參考文獻（越文資料直接逐譯為中文）

「浅羽佐喜太郎公紀念碑建立八五周年紀念會」。上網日期：2011.3.13。網址：<http://www.asaba.or.jp/machiokosi/vietnam/index.htm>。

Georges Boudarel著，章收、胡雙譯。《潘佩珠及其當時的越南社會》（河內：文化與通訊出版社，1997）。

于向東、譚志詞。《越南——革新進程中日漸崛起》（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5）。

于在照。〈潘佩珠〉，載於：黃心川主編。《東方哲學家評傳·越南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頁250-266。

于在照。〈潘佩珠與孫中山〉，《東南亞》，4（2006），頁44-48。

大岩誠。《安南民族運動史概說：越南悲史》（東京：ぐろりあ・そさえて，1941）。

川本邦衛。〈維新東遊期における潘佩珠の思想——ヴェトナム民族運動の起点〉，載於：山本達郎博士古稀記念論叢編集委員会編。《東南アジア・インドの社会と文化》上冊（東京：山川出版社，1980），頁415-439。

川本邦衛。〈潘佩珠と保皇派および革命同盟会との関係1——維新東遊期についてみる〉，《慶応義塾大学言語文化研究所紀要》，12（1979.12），頁25-42。

川本邦衛。〈潘佩珠と保皇派及び革命同盟会との関係2——広州事件前後の回想よりみる〉，《慶応義塾大学言語文化研究所紀要》，13（1981.12），頁51-69。

今井昭夫。〈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社会主義」をめぐる〉，《東京外国語大学論集》，45（1992.11），頁237-250。

今井昭夫。〈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日本滞在経験とその思想形成（資料紹介 東遊運動100周年記念学術交流会議に参加して）〉，《東京外大東南アジア学》，11（2008），頁80-86。

今井昭夫。〈フェ時代の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思想〉，《東京外国語大学論集》，54

(1997.3)，頁61-72。

王民同。〈越南民族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潘佩珠〉，《雲南師範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報》，24：2（1992.4），頁51-55。

内海三八郎著，千島英一、櫻井良樹編。《ヴェトナム獨立運動家潘佩珠伝——日本・中國を駆け抜けた革命家の生涯》（東京：芙蓉書房，1999）。

永聘。〈越南與日本對於國家獨立的觀念：以潘佩珠與福澤諭吉為例〉，《歷史研究》，265（1997.11-12），頁17-34。

田中孜。《日越ドンブーの華——ヴェトナム独立秘史 潘佩珠の東遊（＝日本に学べ）運動と浅羽佐喜太郎》（東京：株式会社明成社，2010）。

白石昌也。《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對外認識》（東京：巖南堂書店，1993）。

白石昌也。「ベトナム開明思想の形成とその展開——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を中心に」（東京：東京大學社會學研究科國際關係論碩士論文，1973）。

任明華。《越南漢文小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安間幸甫編。《浅羽佐喜太郎と東遊運動：指導者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と地域が伝える》（静岡：浅羽佐喜太郎公記念碑建立八五周年記念事業実行委員会，2003）。

寺廣映雄。〈越南初期民族運動をめぐる日本と中国〉，《大阪学芸大学紀要・人文科学》，15（1966.3），頁136-144。

吳雪蘭。「19世紀末20世紀初越南進歩士大夫思想轉變之探討」（北京：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4）。

阮文和。〈潘佩珠的本體論思想〉，《報刊與宣傳》，4（1996），頁33-34。

阮文和。〈潘佩珠的民權觀〉，《哲學雜誌》，9（2008）。

阮文和。〈潘佩珠的宗教觀〉，《宗教研究》，7（2001），頁51-56。

阮文和。〈潘佩珠對於「時代」的觀念〉，《理論生活》，1（1997），頁32-34。

阮文和。〈潘佩珠對於知識在人類生活中之作用的想法〉，《哲學雜誌》，4（1996），頁32-34。

阮光蘇。「從潘佩珠的詩文論其救國與革命精神」（西貢：文科大學碩士論文，1974）。

阮有智。「御津老人時期的潘佩珠詩歌」（河內：河內師範大學語文學科博士論文，1995）。

阮秋賢。「中國維新運動對越南維新運動的影響」（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碩士論文，2002.5）。

阮進力。〈19世紀後半～20世紀初頭のベトナム知識人の日本近代化観〉，《広島東洋史学報》，1（1996.11），頁51-62。

阮進力。〈20世紀初頭のベトナム知識人の『国民国家』観の形成に関する一考察——在日期の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国民国家」観の形成過程を中心にして〉，《広島東洋史学報》，2（1997.12），頁17-30。

阮進力。〈Phan Boi Chauの日本観〉，《広島大学東洋史研究室報告》，16（1994）。

阮進力。《潘佩珠在日本的活動（1905-1909）》（胡志明市：胡志明國家大學出版社，2008）。

阮進力。「ベトナム・日本関係史の研究——明治維新から太平洋戦争まで」（広島：広島大學大学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論文，1999）。

周佳榮。《新民與復興——近代中國思想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7）。

長岡新次郎、川本邦衛編譯。《ヴェトナム亡国史・他》（東京：平凡社，1966）。

英明。《在潘佩珠引導之下，遊學日本的愛國志士和學生》（順化：作家出版社，1952）。

英明。《被監禁在順化十五年的巢南先生》（順化：英明出版社，1956）。

英明。《潘佩珠逸史》（順化：嘉龍出版社，1950）。

英明。《畿外侯彊抵與潘佩珠、潘周楨和黃叔抗》（順化：英明出版社，1951）。

孫光閔。〈我國民族解放史中的潘佩珠〉，《文史地》，13（1956.1），頁53-65。

孫光閔。《潘佩珠與越南人民抗法歷史階段》（河內：文化出版社，1958）。

孫光閔。《潘佩珠與潘周楨》（河內：文史地研究協會出版社，1956）。

徐善福。〈潘佩珠研究（上）（下）〉，《暨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4（1980），頁34-45、35-43轉34。

徐善福。〈關於《越南亡國史》的作者問題〉，《東南亞縱橫》，3（1992），頁35-37。

柴田靜夫。〈ベトナム獨立運動の亡命者を助けた浅羽佐喜太郎〉，《磐南文化》，1（1979），頁25-27。

柴田靜夫。《報恩の碑：義侠の医師浅羽佐喜太郎と潘佩珠》（東京：菁柿堂，2009）。

高春隆。「潘佩珠的人生觀及其歷史意義」（胡志明市：胡志明市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博士論文，2010）。

梁志明。〈梁啓超與《越南亡國史》〉，載於：戴可來、于向東編。《越南歷史與現狀研究》（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頁255-258。

郭妍伶。〈《滄桑淚史》初探〉，《東亞文化研究》7（香港：東亞文化出版社，

2005)，頁209-226。

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1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陳平原。《文學的周邊》（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陳玉龍。〈鯤鵬羈樊籠 重賦《正氣歌》——越南近代革命先驅潘佩珠漢文五言古詩一首詮釋〉，《東南亞縱橫》，2（1983），頁49-51。

陳明書。〈從《獄中書》到《潘佩珠年表》〉，《歷史研究》，69（1964.12），頁46-51。

陳英榮、章收。《潘佩珠在1926-1940年時期的詩文》（順化：順化出版社，1987）。

陳益源、羅景文。〈越南潘佩珠與日本、中國之深厚關係——以潘佩珠對於西方建國英雄事蹟的吸收與轉化為例〉，《漢學研究學刊（馬來亞大學中文系）》，1（2010.10），頁119-141。

陳慶浩。〈從新發現潘佩珠（1867-1940）的漢文小說談漢文化整體研究〉，載於：王三慶、陳益源主編。《2007東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樂學書局，2007）。

陳輝燎。〈介紹潘佩珠在史學上的一些意見〉，《歷史研究》，104（1967.11），頁2-5。

陳輝燎。〈回憶御津老人〉，《歷史研究》，47（1963.2），頁40-44。

陳輝燎。〈潘佩珠——二十世紀初越南愛國運動的代表〉，《歷史研究》，105（1967.12），頁1-10。

陳鴻瑜。《越南近現代史》（臺北：國立編譯館，2009），頁389-392。

陸凌霄。《越南漢文歷史小說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章收。〈一些關於潘佩珠必須繼續研究的問題〉，《社會科學通訊》，1（1993），頁56-62。

章收。〈一部潘佩珠的作品——是《重光新史》還是《後陳逸史》〉，《文史地》，48（1959.1），頁82-90。

章收。〈二十世紀初孫中山及中國辛亥革命與潘佩珠及越南革命之間的關係〉，專於：越南中國研究中心編。《辛亥革命——九十年之後的回顧》（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209-249。

章收。〈近年來關於國外研究潘佩珠的情形〉，《文學研究》，4（2008），頁3-14。

章收。〈從過去到現在關於潘佩珠的研究情形〉，《歷史研究》，104（1967.11），頁6-16。

- 章收。〈新發現潘佩珠的一部小說《空中緣》〉，《文學雜誌》，2（1999），頁79-80。
- 章收。〈蒐集潘佩珠在法國的資料〉，《歷史研究》，308（2000.1-2），頁93-96。
- 章收。〈潘佩珠生於何年？〉，《歷史研究》，97（1967.4），頁60-61。
- 章收。〈潘佩珠最早的兩份外交文件〉，《歷史研究》，90（1966.9），頁61-64。
- 章收。〈關於1918年在日本的潘佩珠的「淺羽佐喜太郎紀念碑」〉，《漢喃雜誌》，2（2008），頁69-72。
- 章收。〈關於潘巢南的兩部自傳：《獄中書》與《潘佩珠年表》〉，《歷史研究》，75（1965.6），頁37-45。
- 章收。〈關於潘佩珠與彊柢兩人關係的一些資料和看法〉，《歷史研究》，45（1962.12），頁19-24。
- 章收。《潘佩珠全集》（順化：順化出版社、河內：東西語言文化中心，2000）。
- 富田春生。〈墓と記念碑——東遊運動が残したもの〉，《南方文化》，12（1985.11），頁189-203。
- 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文學研究所編。《愛國者與作家潘佩珠——潘佩珠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70）。
- 黃國安。〈《越南亡國史》是梁啓超撰寫嗎？〉，《東南亞縱橫》，1（1991），頁36-38。
- 楊天石。〈潘佩珠與中國——讀越南《潘佩珠自判》〉，《百年潮》，10（2001），頁67-73。
- 鄒振環。〈梁啓超、潘佩珠的《越南亡國史》及其在中國和朝鮮的傳播與影響〉，《韓國學研究論叢》1（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頁308-318。
- 劉永文編。《民國小說目錄（1912-19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劉先飛。〈東遊運動與潘佩珠日本認識的轉變〉，《東南亞研究》，5（2011），頁69-73。
- 潘佩珠著，南溟生譯。《天か帝か》（上海：南溟會，1932）。
- 潘佩珠著，范仲恬、孫光閔譯。《自批判》（河內：文史地研究會，1955）。
- 潘佩珠著，范仲恬、孫光閔譯。《潘佩珠年表》（河內：文史地出版社，1957）。
- 潘佩珠著、英明譯。《自判》（順化：英明出版社，1956）。
- 潘是漢著，南十字星譯。〈獄中記〉，《日本及日本人》，臨時增刊179（1929.6），頁129-155。
- 蔣永敬。〈孫中山與潘佩珠〉，《孫中山與中國革命》（臺北：國史館，2000），頁

421-456。

鄧泰梅。《潘佩珠詩文》（河內：文化出版社，1958）。

黎文叢。〈對於潘佩珠詩文喚醒革命之相關問題的一些初步看法〉，《義安師範大學學報（語文版）》，1983。

黎玉聰。〈佛教影響到潘佩珠的人生觀〉，《佛學研究》，5（2000），頁42-45。

黎玉聰。「潘佩珠的世界觀」（河內：社會科學及人文大學哲學博士論文，2001）。

樽本照雄編。《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濟南：齊魯書社，2002）。

賴文南。「潘佩珠的民主思想」（胡志明市：胡志明市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碩士論文，2006）。

懷清。《潘佩珠——生平及其詩文》（河內：文化出版社，1978）。

羅景文。〈東亞漢文化知識圈的流動與互動——以梁啟超與潘佩珠對西方思想家與日本維新人物的書寫為例〉，《臺大歷史學報》，48（2011.12），頁51-96。

羅景文。〈潘佩珠研究論述目錄（1950-2010）〉，載於：王三慶、陳益源主編。《東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論叢（二）》，（臺北：樂學書局，2011），頁265-308。

Boudarel, Georges (trans.), "Mémoires De Phan Bội Châu," *France-Asie/Asia* 22:3/4(1968), pp.3-210.

Boudarel, Georges, "Bibliographie Des Œuvres Relatives À Phan Bội Châu Éditées En Quê Ngũ À Hanoi Depuis 1954 ,"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56(1969), pp.157-176.

Boudarel, Georges, "Phan Bội Châu Et La Société Vietnamiennne De Son Temps," *France-Asie/Asia* 23: 4(1969), pp.354-436.

Duiker, William J.,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Vietnam, 1900-1941*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Le Jariel, Yves, *Phan Bội Châu(1867-1940): Le Nationalisme Vietnamien Avant Ho Chi Minh* (Paris: L'Harmattan, 2008).

Marr, David G. (ed.), *Reflections from Captivity: Phan Bội Châu's Prison Notes & Ho Chi Minh's Prison Diary*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8) (trans. by Christopher Jenkins, Khánh Tuyết Trần, Sanh Thông Huỳnh).

Marr, David G., "Hanoi Scrutinizes the Past: The Marxist Evaluation of Phan Bội Châu and Phan Chu Trinh," *Southeast Asia* 1:3 (1970), pp.242-254.

Marr, David G., "Phan Bội Châu: Asian Revolutionary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1(1971), pp.77-88.

Marr, David G., *Vietnamese anticolonialism 1885-192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Nguyễn Thế Anh, "Phan Bội Châu's Memoirs and the Autobiographical Genre in Modern Vietnam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Melbourne) 5(1992.1), pp. 35-43.

Unsel, Jörgen. *VietNam: Die Nationalistische und Marxistische Ideologie im Spätwerk von Phan Boi Chau(1867-1940)* (Wies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80).

Vinh Sinh & Nicholas Wickenden (trans.), *Overtured Chariot: The Autobiography of Phan Bội Châu*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Vinh Sinh (ed.). *Phan Bội Châu and the Đông-Du Movement* (New Haven: Yal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1988).

Comments on the Study of Phan Boi Chau (1950-2010) and the Meaning of Studing of His Chinese Novels

Ching-wen Luo

Abstract

Phan Boi Chau (1867-1940) is the important leader who understood the world situation earlier of modern Vietnamese national movement. Because he lived on changing times, there are many multivalent meanings among his political ac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e and East Asia intellectuals, his multiple identities of writing and his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which is based on Confucianism. Phan Boi Chau is the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East Asia and Vietnam intellectual really so many studies focus on him and have multidimensional subject gradually.

Nevertheless, the researcher neglected Vietnam research and had language barrier of Vietnamese in the past. This situation made the researcher hard to grasp the studies of Phan Boi Chau in Vietnam or International. This thesis tries to review the studies of Phan Boi Chau and offers new opinions about his Chinese novles for future reference of scholars.

Keywords (關鍵詞) : East Asia; modern Vietnam; Phan Boi Chau; Chinese novles

Ching-wen Luo : Ph.D. Candidate in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E-mail : jingwen123@pchome.com.tw